

非常苛刻，不但要几倍的排印费，还不准印上报头和照片，同时从排版到印成必须在一个晚上完成，天亮之前必须把成品搬走，不得在印刷所里停留片刻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前哨》创刊号的影印本上，左联五烈士的照片是贴上去的，这是当时的原样。从第二期起，《前哨》就改名为《文学导报》，这名字看来不象《前哨》那么可怕，也就较容易为印刷所老板所接受。这便是《前哨》改名的原因。从版面的特别到改名的原因，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反动派白色恐怖的严重及斗争环境的险恶。《文学导报》在地下状态中整整战斗了八个月，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停刊。随着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发生，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，革命文学运动的形势也起了根本的变化。左联的活动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，由丁玲主编的公开的左联机关杂志《北斗》以新的战斗姿态于同年九月创刊了。

左联除了在国内创办刊物外，还在国外创办刊物。如左联东京支盟就曾在日本办过三个杂志：《支流》、《杂文》、《新诗歌》。《杂文》出版后，因为学习鲁迅思想作风，比较尖锐泼辣，反响颇大，出至第三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止了。第四期改名《质文》（这个名字是郭沫若同志起的），在日本印好后运回国内发行。鲁迅先生的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，就发表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出版的《杂文》第二期上。

左联的刊物记载着左联斗争的光辉历程，她是一面光辉夺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红旗。在五十年后的今天，仍然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。

“左联”纪念“五一”的由来

一九三〇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，是“左联”成立后迎来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治政意义的纪念日。在节日前夕即四月廿九日，借西藏路福州路附近爵禄饭店举行了一次全体盟员大会，出席盟员约三十余人。会议由冯乃超作《政治报告》，鲁迅致祝词，秘书处作会务报告，并通过了“有组织地参加五一并发动群众”等十个决议案。当时正是左联成立的初期，为了高举左联的战斗旗帜，他在自己的纲领中庄严地宣告“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线上，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，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。”“我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不能不参加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，向国际反无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斗争。”为此，左联十三种机关刊物和外围刊物联合编辑《五一特刊》，随刊物赠送。这份特刊登了七篇文章和两幅漫画。第一篇是《左翼作家联盟“五一”纪念宣言》。这篇文章气势磅礴地宣告：“我们左翼作家联盟，不是什么艺术流派的结合，而是在当今‘万国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’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与战争的时期，两个势力针锋相对——两个敌对的营垒血战肉搏的时候，为参加伟大革命斗争而结合的”，“我们不能幽禁于大会堂中作宗教的仪式，街头是我们的战场，口号替代我们的欢呼，我们用斗争来纪念‘五一’”。宣言最后高呼“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屠杀工人！反对白色恐怖！反对法西斯蒂主义！”

以下五篇文章的题目与作者依次是《今年五一节的意义》（彭康），《今年的五一》（冯乃超），《拥护苏维埃代表大会》（洪灵菲），《从五一想起四一二》（陈涛），《五一纪念中两只狗的跳舞——王独清与梁实秋》（灵声）。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当时的斗争要求，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之下，指出必须摒弃那种“会堂里的纪念仪式”。彭康在文中指出革命力量应该“检阅自己队伍来准备日益迫近的坚决革命斗争的一天，这是革命力量的小操练，这是工人阶级获取胜利的大演习”。冯乃超在文中激情地描述了“广大的农民起来斗争，红军有了庞大的发展，苏维埃区域蔓延全国，工人斗争走到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势……一般知识阶层再不能忍受非理的压迫，大部分左倾起来，尤其是自由大同盟的成立，左翼作家联盟的结合，学校斗争的增加，都是说明这个事实。”

总之，《五一特刊》的篇篇文章，犹如锋利的匕首投向敌人，预示着“左联”的成立将要和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展开一场激烈地搏斗，对国民党残酷镇压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反革命军事围剿，也是一个有力地冲击。因此这份特刊将作为一份珍贵的左联史料而传之后世。